

「胡適與自由主義：紀念胡適先生一百二十歲  
誕辰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

**Hu Shih and Liberalism:**

A Summary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ommemorating the 120<sup>th</sup> Birthday of Hu Shih

段 煉\*

Duan Lian

2011年12月17日為中央研究院前院長胡適（1891-1962）120歲誕辰紀念日，2012年亦恰逢其逝世五十周年紀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於2011年12月16、17二日，邀約海內外22位胡適思想研究專家齊聚一堂，共同召開「胡適與自由主義：紀念胡適先生一百二十歲誕辰國際學術研討會」。本次會議圍繞「自由主義」這一核心觀念，從政治、思想、文化、社會等不同層面，探討胡適與近代中國自由主義之發展，反省此一過程之成就與限制，並思索其現實意涵。從論述主旨而言，本次大會報告的22篇論文，大致可分為如下四個面向：

---

\* 作者現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人員。

首先，是對於自由主義多元思想內涵的探討。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耿雲志在〈也談胡適的《容忍與自由》〉一文中，對胡適所強調的「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的議題再作考察。文章談到，「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並非胡適的一貫主張。從自由主義的理論原則上說，「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是難以成立的。而且，胡適之所以在1959年兩次談到這一命題，也與當時他對自身地位的顧慮以及對臺灣局勢的顧慮有關。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周質平在〈胡適論辛亥革命與孫中山〉一文中，展示了在不同歷史時期，針對「暴力革命」、「知難行易」等議題，胡適從文化和社會的面向，對辛亥革命的反思及對孫中山（1866-1925）歷史功績的評價。透過這些分析可以看出，辛亥革命若不能繼之以新文化運動，孫中山所創建的民國將缺少許多新意和光彩；而胡適所領導的新文化運動，若沒有辛亥革命的成功在前，其收效和影響也絕不至如日後之神速與深遠。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退休研究員呂實強（1926-2011）在〈淺論胡適的自由思想〉中，以其自身經歷，詳細回顧了胡適在中央研究院內的數次講話以及晚年的健康狀況和心境，也涉及徐復觀（1904-1982）對胡適的批評。作者指出，胡適的自由思想，最主要是建立在儒家孔子（前551-前479）、孟子（前372-前289）以及老子（生卒年不詳）等思想家的道德觀念之上。由於孔子的自由思想植根於對人類的關懷，所以胡適稱道以「仁」為所有德目的綱要，其內涵就在於做一個理想的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簡明海在〈胡適的自由主義人生觀〉中認為，一方面，胡適的自由主義人生觀包含了科學主義、個人主義、實用主義、「社會不朽論」等不同的概念範疇；另一方面，胡適也不是對於人性與人生的陰暗面無所認識。他對於人生無可逃避的一面，同樣提出了相當激勵人心的解釋，象徵著自由主義所具有的樂觀態度。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段煉在〈「穆姑娘」的關懷：五四啓蒙思想中的新道德觀研究〉中，聚焦於胡適、蔡元培（1868-1940）、陳獨秀（1879-1942）、李大釗（1889-1927）等

五四啓蒙知識分子高度關切的道德觀念。五四時期是一個功利主義與個人主義盛行的時代，但啓蒙知識分子倡導的個人主義並非「原子式」的個人，其背後依然有著「大我」的價值尺度。而他們所主張的功利主義，則拒斥了純粹物質慾望的滿足，強調功利主義背後的精神價值。五四啓蒙思想中的道德觀由此亦展示出新的內涵。

其次，是自由主義與政治抉擇以及國家制度之間的關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國立中央大學人文研究中心主任汪榮祖在〈當胡適遇到蔣介石：論自由主義的挫折〉中，透過分析胡適與蔣介石（1887-1975）的關係，來了解兩位重要歷史人物及其時代，並試圖看出以胡適為代表的自由主義思想及實踐，在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威權體制中是如何遭遇挫折。作者指出，胡適一生除學問以外，致力於言論自由與民主政治，這也是他想影響蔣介石的重中之重。但從兩人的關係來看，這一影響最終是徹底的失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陳三井在〈乘桴浮於海：論1949年胡適的抉擇〉一文中，選取危急存亡的1949年作為切入口，分析胡適與國、共兩黨之間愛憎離合的關係，並以此觀察胡適當年作出政治抉擇的心路歷程。實際上，逃離大陸共產專制政權、放棄不夠民主的國民黨政權，前往美國的胡適所經受的也是生命之中從未有過的寂寞。從這份寂寞之中，亦可一窺自由主義的當代困境。日本廣島大學大學院綜合科學研究科水羽信男在〈中國自由主義分子的分歧：1930年代的胡適與羅隆基〉中強調，同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胡適與羅隆基（1896-1965）的思想分野，其根源在於對自由與平等的不同態度。胡適較重視以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 1909-1997）所強調的「消極自由」，而羅隆基要求通過國家的政策保障自由，即重視「積極自由」。胡適力主從集團主義的束縛下解放自由的個人，拒絕國家干涉自由，而羅隆基偏向於為實現個人自由，須先構建一個平等社會的主張。山東泰山學院歷史與社會發展學院教授萬昌華在〈胡適國家政治體制思想的考察〉中，指出胡適的國家政治體制分為兩個部分，一是一以貫

之的憲政主義政治主張，二是他對未來中國中央與地方政府樣式、行政結構及其運行機制的設想。其中，前一部分的主要內容，是如何運用憲法法治、民主選舉制度以及反對黨制度等建立民主憲政的國家。後一部分的內容，則主要是未來中國的國家權力結構應是議會民主制的、聯邦制的、高度地方自治的，政府與領導人的任期與許可權都要有明確的限制。韓國東北亞歷史財團吳炳守在〈胡適與中國的反共自由主義：中國自由主義的理念化過程（1941-1953）〉一文中談到，作為活躍在冷戰時期的反共知識分子的代表，胡適認同作為反共體制的蔣介石體制的正當性，並且積極防禦來自國內外的對於該體制的批判。另外，胡適也以美國式的政治文化為模型，強調輿論與思想自由的同時，主張通過安定的政治操作來對抗共產體制，即在美國主導的戰後秩序中，獲得「自由中國」的安全保障。

第三，是自由主義理念與現代學術和知識譜系之間的互動。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宋廣波在〈胡適與科學〉一文中，通過描述「實驗主義」自「五四」以來在中國學術思想界所產生的影響，指出胡適將他推行的方法稱為科學方法，嚴格說來應該稱作實驗主義的方法。實驗主義對於胡適的學術研究有著重要意義，而胡適對於科學理念的理解以及興趣，也推動了科學思想的傳播，促進了科學事業在臺灣的發展。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雷頤在〈名同實異：胡適的「整理國故」與大陸當代「國學熱」比較〉中，通過對胡適「整理國故」和中國大陸當前「國學熱」的理路及其背景的分析，指出二者根本指向的不同：一為「學問」，一為「意識形態」。作者也在文中提醒，思想史研究須警惕「唯文本化」，應將觀念嵌入具體的歷史脈絡中進行分析。如果僅作脫離歷史脈絡的「純文本」分析，對於兩個實質完全不同的文本就可能得出「完全一致」的結論。廣州中山大學政治科學系副教授黎漢基在〈胡適與當代新儒家——以徐復觀的論戰為線索〉一文中指出，徐復觀對胡適的敵對態度並非突如其來，而是有著隨形勢而變的發展過程。而且，通過胡適與徐復

觀之間的論爭，亦可觀察民初以降學術界「中心」與「邊緣」之間的緊張關係，由此顯示出新儒家在反傳統情境中的思想狀況。北臺灣科學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教授江騰燦在〈薪火相傳：胡適初期禪學史研究的最新動態及其作為跨世紀現代性宗教學術研究典範的傳承史（1925-2011）再確認〉一文中，將最近86年來，從大陸到臺灣胡適禪學研究的開展及其爭辯史的解說，視作戰後臺灣現代性宗教研究典範薪火相傳的最佳例證。而胡適與忽滑谷快天 (Kaiten Nukariya, 1867-1934) 的著作的關聯性，以及胡適禪學研究在中國學界和戰後臺灣學界的回應，正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關節之處。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博士生李曉波在〈夏道平對近代中國自由主義經濟思路的反思〉中，以《自由中國》的作者之一——學者夏道平（1907-1995）為研究個案，強調近代中國自由主義在其引進和傳播過程中，受到樣本擇取和中國語境的雙重影響。在二十世紀上半期，中國自由知識分子普遍追求政治民主（政治平等）和經濟民主（經濟平等）的統一，主張用累進稅、經濟統制等方式實現經濟平等。但到了二十世紀下半期，隨著內外形勢的變化，在臺灣的自由主義者卻開始出現向自由經濟轉進的趨勢，經濟自由對於民主政治的重要性日益被重視起來。美國德堡大學 (DePauw University) 歷史系教授江勇振在〈胡適詮釋杜威的自由主義——以新發現的杜威在中國演講殘稿為案例〉一文中，通過比勘新發現的杜威 (John Dewey, 1859-1952) 的〈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殘稿與胡適的翻譯，檢視胡適如何挪用杜威的思想，並借此釐清胡適與杜威在自由主義理念上的分野。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孫中曾在〈思維真理：胡適、杜威哲學與中國在知識上的真理重建〉中談到，胡適試圖解決中國的問題，是從西方科學發展的現實，後轉而溯源西方科學源頭，並開始其哲學的旅程。而這一工作，主要是以杜威的哲學及其實驗主義的真理論發展而成。

第四則涉及自由主義與大眾媒體、大學等公共空間以及與臺灣本土的连接。安徽大學歷史系教授陸發春的〈新生活的觀念及實現——

以五四時期胡適及《新生活》雜誌為討論中心》一文，關注胡適作為五四時期新生活觀念提倡者的一面。胡適、李辛白（1875-1051）、李大釗等倡導新文化的知識分子，以1919年8月至1921年8月出版的《新生活》週刊為文化陣地，反對阻礙新生活的舊道德，打破軍閥勢力，調查和了解中國社會現狀。他們以面向勞動大眾的社會生活改良為起點，倡導人們追求大眾的、進步的新生活。胡適等新文化派代表人物對新文化與新生活關係理論探究，是新文化運動的一項重要內容。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何光誠在〈胡適與香港大學的因緣：改革大學的中文教學〉中談到，胡適一生獲頒三十餘個榮譽博士學位，頒給他第一個榮譽博士學位的是香港大學。港大除了推崇胡適在中國的學術地位以及發起新文化運動的貢獻之外，還想請他對已不適應時代要求的港大舊式中文經史教學作出改革建議。胡適與港大的這番因緣，正是新文化運動南來香港的一個寫照。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黃克武在〈胡適與《文星雜誌》〉一文中注意到，《文星雜誌》從溫和到激進的風格變化，深受胡適思想的影響。1958年胡適返臺之後，刻意與《文星雜誌》保持距離，因此他在《文星雜誌》的角色並非主動參與，而是被動地被推上舞臺。至1958年時，胡適或許自覺受到蔣介石之重用，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一職。此一角色使他與反對威權政治之自由主義刻意保持一定距離，思想與行動上亦趨於保守。不過，胡適所代表的政治主張與文化關懷，卻因為《文星雜誌》的努力推廣，發揮了其影響力。1962年之後，《文星雜誌》在李敖接棒後的激進化轉向，無疑深受胡適思想的影響。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陳儀深的〈胡適晚年在臺灣〉一文，聚焦於1949年之後胡適的晚年歲月。論文通過描述胡適50年代滯留美國期間與臺灣（中華民國）的連接、任中央研究院院長期間對於學術的推動及其日常生活的點滴，從中一窺胡適晚年與臺灣及臺灣人的互動關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潘光哲在〈胡適對「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回應（1949-1952）〉一文中，談及胡適最初如何探討處在「鐵幕」之

下的知識分子的處境，進而了解晚年胡適如何在意識形態衝突之下做出自我選擇和解釋，並試圖將其轉化為（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批判／鬥爭的思想資源。由此亦可感知胡適晚年的心境與世界冷戰格局下的思想氣氛。

誠如本次研討會宗旨所言，胡適先生的生命旅程與思想世界，在二十世紀中國／臺灣的歷史脈絡裡都有獨特的貢獻。與他相關的思想理論遺產，無論成敗得失，均已沉澱為人們可以盡情汲取的「思想資源」。此次會議環繞自由主義這一觀念所開啓的眾多議題，亦為今後的相關研究提供了新的起點。

（責任編輯：詹荃亦）